

森林 输水管



三城记小说系列

香港卷

第一輯

许子东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输水管森林



设计：李一男
制作：李一男

输水管森林

三城记小说系列

香港卷

第一輯

许子东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2001-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输水管森林/许子东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一辑·香港卷)

ISBN 7-5321-2227-1

I.输… II.许…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89 号

责任编辑:薛 剑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三城记小说系列

第一辑(香港卷)

输水管森林

许子东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227-1/I·1790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序

□许子东

这本选集收选了在 1996 年至 1997 年间初次发表(或初次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十七篇,其中包括几篇 1996—1997 市政局中文创作奖和第二十四届青年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近年来的香港文学以几百字专栏散文与十至十五万字的袖珍便携式长篇(或者专栏结集)较为发达,能够发表几千上万字短篇的文学杂志不多。印刷形式、发表渠道及流通过程都会制约、影响文体(甚至语言)的发展变化,所以香港的短篇或者很精练(报纸副刊通常只提供数千字篇幅),或者很舒展(一些长篇中的章节又可以独立发表自成短篇,这也是香港文学的一种颇为独特的文体现象。)香港目前

并没有专门发表中篇小说的期刊,市政局及其他文学评奖对小说字数的规定也较具弹性,一些二三万字的小小说常常在《素叶》或《香港文学》上发表或连载。在没有中篇选本的情况下,“短篇小说选”责无旁贷也应当收集这类小说。

在解释“发表年限”与“短篇定义”以后,仍有一个概念“香港”需要继续界定——这种界定牵涉到一个在评论界一直引起争论的话题:什么是“香港文学”?

在确定“香港短篇小说”的范围时,至少有四项条件通常会被考虑:第一,作者身份(是否“香港法律定义下的香港居民”);第二,写作环境(是否“在本地写作”,是否至少有一个时期在香港生活);第三,发表出版(是否在香港拥有读者);第四,作品内容(是否直接描写香港)?

在我看来,第四项条件不是定义香港小说的先决条件,可以暂时先不考虑。刘以鬯《寺内》、金庸《鹿鼎记》都不写香港,但应该都是香港小说。反之大概没有人会将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列为香港小说——虽然小说从题材到题目都写香港。作品中的“香港故事”,这是评论家和香港文化研究者后来才关心的题目。小说内容(是否)描写香港与能否列入香港小说范围,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其他三项——本地身份、本地写作、本地出版——显然都是确定“香港小说”范围的重要条件。如果三项条

件皆符合,就像本选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那样,当然都是典型的“香港小说”,不必多论。但如果有作品不能完全符合这三项条件,情况就会变得稍微复杂一些:

第一种情况如收入本选集的《安卓珍妮》,董启章是香港作家,也在本地写作,作品在台北获奖、出版。以往西西也有不少小说集在台北出版。可见缺乏条件三,仅依据“香港身份”与“本地写作”,人们仍然会认为《安卓珍妮》是“香港小说”。

第二种情况如黄碧云、钟晓阳、亦舒等人的小说,香港作家,作品也在香港发表出版,在香港拥有很多读者,但可能目前不是“在本地写作”,而是在伦敦、悉尼或多伦多写作。我在另一本小说选的序文中专门讨论过这种现象,就如郁达夫写于日本的《沉沦》和徐志摩写于印度洋邮轮的《再别康桥》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一样道理,虽然不在“本地写作”,仅依据“香港身份”与“香港读者市场”,人们还是会将黄碧云、钟晓阳的作品视为“香港小说”。

这是否说明在作者身份、写作地点与读者对象三项条件中,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两项就可以被视为香港小说呢?我们来看比较令人困惑的第三种情况。有些作者可能不是“香港法律定义下的香港居民”(可能没住够七年;或不愿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或者在别的地方出名,例如余光中、施叔青,在香港住了很久,人们还是将他们视为“香港人”),但他们在香港写作,也在香港发

表,并拥有香港读者——我在编选这本小说选的过程中常常疑惑:究竟《赤地之恋》、《牛蛙记》、《香港的故事》等是否属于香港文学?如果缺乏香港身份,能否依据“本地写作”与“本地出版”这两项条件确定一篇作品是否香港小说?——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本选集收入了短篇小说《孔晴》,因为我觉得作品中的“爱情战争”场面很有香港味道,文字也非常特别。虽然《素叶》编辑告诉过我,作者海静在香港生活,却可能“不是香港人”。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作品是否表现香港,以及作品是否对香港文学界乃至香港文学史产生影响,才成为人们考虑的附加因素。(后来找到作者,原来海静也是地道的本土作者。)

综合以上几种可能的情况,可以引出两点推论:一,列入本选集选择范围的“香港小说”应该符合本地身份、本地写作与本地出版这三项条件中的至少两项条件。单独一个因素总是不够的(比如作者虽有香港身份,却一直在内地或国外写作和发表,香港读者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其作品,这时他或她的小说也很难入选;……)。二,如果拥有“香港身份”,再加上“写作环境”或“本地出版”等任何一项条件,便充分符合“香港小说”的一般定义。但如果缺乏“香港身份”,则需要满足其他各种条件——“本地写作”、“香港出版”,再加上描写“香港故事”以及对香港文学史产生影响等附加因素,能不能被大家约定俗成地视为“香港小说”,仍是疑问。可见三项条件

并不是同样重要,“香港身份”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否说明“香港文学”之所以成为“话题”,归根结底是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与觉醒有关?

不过我在参与编选这套选集时,既关心“香港”,也关心“小说”。诚如藤野先生给鲁迅的临别赠言: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我所依据的标准一是“好作品”——不仅在香港文学范围里看是“好作品”,而且在全部现代汉语的文学中,在文学的一般定义中也是“好作品”;二是“重要作品”——也就是说近年来香港小说发展中有影响有代表或引起争议的作品。两条标准之中,前者是主要的标准。而“好作品”的标准可能比较主观,“重要作品”却比较有客观依据——比如获奖、引起争议等等。我希望这套选本至少有两种功能,一是显示这两年来香港短篇小说中的佳品杰作,二是显示香港短篇小说的最新变化发展趋向。两者可以统一,但也常常有所不同。

二

按照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的有关规定,获奖作品应该由市政局图书馆结集出版,而不能在其他杂志或书籍发表出版。感谢市政局图书馆和作者的允许,我们可以将许荣辉的《心情》收入本选集。这个短篇能够获得1996—1997 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小说组的第一名,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传递着一种特殊时刻的特殊情绪,更在于小说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而且比较复杂的角度来表达“九七心情”。为金钱、良知、生存策略等现实问题所困扰的男主人公,独自坐在那个雕像被淋红漆的公园里回想往事,他“母亲工作的饼厂曾在公园侧,……他一直无法记牢这座都市一些重要事件和它们发生的日期,记不牢并不是他对这都市没有感情,而是他一直感到他是在用全副精力吃力地应付着平凡的日子,再无余暇顾及了……大概该是六十年代尾的某个日子,但那天的天气他是一直记得很清楚的,暖洋洋的秋日照射在工厂的大门,大门却是关闭着,疲惫不堪的女工坐在厂门口,都是很无奈的样子。这个情景在他少年时期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他日后一直无法接受那些低矮楼房已变成高楼大厦的事实。”这些年来有不少小说都描写主人公在心里以温馨的感觉怀念过去并排斥今天的高楼大厦,《心情》与其他因为太热爱这个城市因而对这个城市产生了陌生感的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这里有一个曾经参与艰辛创业如今却无法分享繁荣的老年女工的视角。“这座都市的人就像围绕着这都市的海港的水,都换了。”几十年后主人公又和母亲一起坐电车经过被明亮大厦包围的公园,主人公正要抒发一些感慨,身旁的母亲却已疲惫睡着了:……

“此地是他乡”主题可以有种种不同变奏:黄碧云(《失城》)、黎翠华(《仲夏之魔》)、也斯(《边界》)渲染

的是漂泊或回流的失落，马国明（《荃湾的童年》）、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许荣辉（《心情》）等感叹城市世事变迁，王璞（《红梅谷》、《话题》）、舒非（《窗外红花》）则描写南来者总是寻找往事旧梦……如果说所有这些“此地他乡”的感慨背后可能都有具体的历史政治文化线索可以寻找，那么在更年轻一代笔下的对这个城市的疏离，其意象指涉就更为抽象。似乎不仅近年来“我们的城市”成了“他乡”，而是怀疑：城市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或者：城市本来就是“他乡”？十七岁中学生韩丽珠的短篇《输水管森林》已经被收入不止一个选本，小说用一连串残雪式的细节（洗肠、偷窥、病房等）将外婆的垂死（和《心情》异曲同工，又是辛劳大半生的老年女人——笔者注）与城市的更新联系起来，其中输水管更成为既令人赞叹又令人恐惧的都市风景：“我看见对面大厦的水管像一堆肠子弯弯曲曲地缠在一起，盘结在一楼的檐篷上。那之前，它笔直地爬上楼顶，然后走进每所房子里……多条苍白的输水管，在医院背后的墙壁，不规则地分布着，像树木的枝丫，向四面八方伸展。”除了这种视觉上的晕眩，还有听觉上的烦躁。黄敏华的《少言妙音》将都市的声音作为主题：“我尝试将难听的声音都想象成眨眼之间就会消散的烟霞，又想象它是由垃圾车薰散开来的臭气，可以在微风一拂以后湮灭。但总是行不通。……那夜我再走到嚣闹的旺角，那里比日间更能容忍噪音的存在，我拿出两支手枪，站在千万行人与小贩

的面前向他们扫射，倒下后竟不是一片宁静，却是人们不倦的叫声笑声说话声和吵架声，我仰声大叫，醒了。我摸着床头的菜刀，想着人们被割破喉咙的情形……”小说结尾处的暴力场面过于血腥，但贯穿全篇的声音恐惧以及少言和妙音这两个人物叙事角度的微妙切换委实精彩。小说发表于《第二十四届青年文学奖文集》（香港：获益出版，1998），但获奖是在1996年（“第二十四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和《心情》一样，我们将获奖和参加公开展览也视为某种形式的“发表”，因而收入本选集。

和“此地是他乡”同样值得注意的香港近年短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爱情即战争”。三角四角恋爱的“情场”多数是流行小说的“战场”，五四新文学主要表现热恋者与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而现在香港比较严肃的小说则侧重于分析发生在热恋男女或热恋同性之间的“爱情战争”：提防、猜疑、试探、防范、进攻、躲闪、计谋、策略、犹豫、迷惑……发表在《素叶》上的短篇《孔晴》，文字细碎烦腻得很有特点，故事在啰嗦平淡中渗透张力：女秘书很多次搭乘上司的车，经过无数的心力角逐，最后还是没有什么事（或者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这是不是每天在中环湾仔铜锣湾发生的“典型”的香港爱情故事？其实，“男女爱情战争”的战火源于上海（张爱玲的《传奇》），“同志爱情战争”在台湾战事更加激烈，似乎只有第三种“爱情战争”才可能是香港的首

创。这种情爱故事既不发生男女之间,也不爆发于同性之中,而是所谓“一个人的战争”:电影中有“东方不败”的神秘双身,小说里则有董启章制造的雌雄同体安卓珍尼。黄碧云和董启章是近年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小说家。前者的创作根植于情感心创,所以温柔暴烈,快意恩仇,激愤张狂;后者的灵感则来自理性实验,所以能把玩形式,制造突破,解构理论。如果说前者的艺术是一种“病”,一种痴迷;后者的书写则是一种冷静的“后设”。《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讲述女主人公烦腻了丈夫在半山豪宅里的呵护统治,到大帽山探险时终于又害怕原始野性的男人,最后在她所寻找的单性繁殖的动物“安卓珍尼”身上找到了自己。小说在台湾获奖时得到平路、钟玲等人的激赏,被认为是“以女性视角而反思男性沙文主义的精辟处……触及了性别问题的核心,直指繁衍这件事的本质”。其实,在别处(如短篇《皮箱女孩》)董启章解析渲染男性的性幻想也可以像罗贵祥(《爱吃消夜的二哥和夜光表》)一样出神入化。在有意识背负香港作家的使命感而写作的《地图集》、《永盛街兴衰史》中,董启章建构身份认同的努力也颇有成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小说发展到现今这样的地步,其基本形态差不多已经完全确立,其可能性好像已经消耗殆尽,连什么离经叛道的反小说实验也已经山穷水尽了。”所以“与其说我是在写小说,或者是创作小说,不如说我是在模拟小说。”——董启章的这种小说理论与

实践,也代表了近年香港文学发展中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当然,香港小说的魅力之一,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很难用一两个所谓“主流现象”来加以概括。同样契合甚至带领青年人的阅读潮流,关丽珊的《青鸟》(和她认真编选的很多新人小说集一样)清新浪漫,潘国灵的《我到底失去了什么》色彩奇异,陈洁心的《铁轨上的掠影》更加飘忽反叛。收入本选集的黄碧云的《心经》大胆描写中国新变化(港人在内地开厂失火又遇女人等等),笔触是一贯的细柔狂暴,细节画面却比她过去《双城月》等奇幻怪诞的“文革”想象要“现实”具体得多。颜纯钧《耳朵》是以荒诞解析正常的力作。比较以往的五四小说或当今的香港散文,香港小说中以讽刺幽默见长的作家似乎不多。李默发表在1996—1997年《明报》上的一系列短篇水准其实差不多,《改头换脸之旅》可能也没有比其他几篇更好。读到崑南的几个短篇我实在有些惊喜,部分原因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是从契诃夫、莫泊桑那里开始读短篇的,虽然现在已生活在充满“创意媒体”的后现代,对各种长短文体实验已见怪不怪,但可能骨子里对短篇小说,还是有一个比较 Classical 的“偏见”……像董启章《地图集》、钟玲玲《玫瑰念珠》以及钟伟民、李碧华、也斯等人的一些近作,虽然从文字看我很喜欢,但终于不知如何在文体上切割到“短篇小说”的定义中去,所以最后只能割爱。西西也许有些例外,《骨架》是一个典型的短

篇(内容也是讨论短篇写作),《浪子燕青》却是一种前卫大胆的文体实验。两篇作品均收入本选集。

本选集具体编选过程前后大半年。我的办法很简单,自己先读作品,阅读之前尽量少看评论(评论也确实不多),少听别人意见(谈论小说的人也不多)。我“通读”了这几年的《香港文学》、《素叶》、《香港笔荟》、《香港作家报》等刊物以及《明报》、《星岛日报》等报纸的文艺副刊,也翻阅了大部分这几年在出版的香港作者的短篇小说集,还浏览了诸如《良友》画报甚至《明报周刊》等有时刊登小说的流行杂志,等等。我的体会是香港不是很少人写小说,而是很少人评小说。在阅读几百上千个短篇的过程中我列出初选目录,这时再设法听取一些专家(大都是学院中人)的意见。我应该在此向黄子平、王德威、刘绍铭、刘以鬯、梁秉钧、陈炳良、西西、何福仁、许迪镛、郑树森、颜纯钧、王璞、黄继持、小思、董启章、蔡嘉荦等同行师友表示感谢。他们或者给我提供详细意见,或者只是稍加指点提醒,却都对本书的编选有很大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我在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很多学生,他们不仅热心给我推荐具体作品,更重要的是让我分享他们真实的细致的阅读体会,有时各抒己见,争论激烈。他们中间有些人颇热爱创作,他们是我想象中此书的基本读者。或许过几年他们就会成为作者之一,也未可知?

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好作品和重要作品被遗漏,入选的小说也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是好作品或重要作品。好

在香港现在开始有很多不同选本,或者可以互相补充,从不同侧面显示香港文学的佳作精品及发展趋向。

许子东

华东师范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等。主编有《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等。